

【历史卷】

通古今之变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25周年精华集

主 编：邴 正 邵汉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 25 周年精华集 [历史卷]

通古今之变

本卷主编 尚永琪

吉林人民出版社

通古今之变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 25 周年精华集[历史卷]

主 编:邴 正 邵汉明

责任编辑:翁立涛 封面设计:翁立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 - 5649710

印 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3.5 字 数:3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 - 206 - 03319 - 9/G · 1400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 000 册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顾 问

王慎荣 《社会科学战线》首任主编、研究员
关德富 《社会科学战线》二任主编、研究员
周惠泉 《社会科学战线》三任主编、研究员
赵鸣岐 《社会科学战线》四任主编、研究员

编委会

主任：邵汉明
副主任：王卓 于德钧
成 员：尚永琪 马妮 李华 王永平
王玉华 胡维革 李彦珍 翁立涛
潘锐 马捷 陈家威

战线无垠思无尽 博文添绿意添新

——为《社会科学战线丛书》序

郅 正

1978年被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科学的春天”。在那一年的3月，我们做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走入了大学校园。不久，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那真是一个春潮涌动，令人感慨万千的春天。

正是在这万象更新的“科学的春天”，我读到了刚刚问世的《社会科学战线》，她那厚重的学术风格，广博的学科领域，以及锐意创新、推动思想解放的探索精神，很快风靡校园，得到师生们的钟爱。也许就从那时起，我与《社会科学战线》结下了不解之缘。

25年过去了。25年来，人世沧桑，天地巨变。《社会科学战线》也走过了风风雨雨。也许是某种巧合吧，我由一名《社会科学战线》的读者，渐渐演变成作者，近年又转为编者的一员。常言说“渐行渐远”，我与《社会科学战线》，却“渐行渐近”，这也许就是“不解之缘”吧。

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魅力，自立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之林呢？是她的名字吗？《社会科学战线》的名字明显带有时代的痕迹，并不那么时尚，更不那么新潮。是她那厚重的篇幅吗？遍览群刊，厚者如云，《社会科学战线》并非鸡群鹤立，能执牛耳。是她偏得天时地利吗？天时者，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早已四海同一了。说到地

利,《社会科学战线》地处北国边塞,既非京都繁华之地,也非花团锦绣之乡,而属于正待振兴的“老工业基地”!

读了《社会科学战线》25年来发表文章汇编而成的丛书,读者也许会参悟到其中的奥秘,从中领悟到《社会科学战线》两代编者的苦心追求。

作为学术期刊,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学术方向的同时,都要追求其学术性。至于何为学术性,诸子百家,其说不一。学术一般是指系统化、专门化的知识活动。学术性首先应该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5年走过的道路,体现了两代编者一种严谨凝重、持之以恒的求真精神。求真易而执着难。真理需要一个发现过程,同样也需要一个被认识、接受的过程。真知灼见并非一经刊出就举世公认,欢声雷动。恰恰相反,真理的问世往往是曲折的,有争议的,甚至是沉寂的。炼丹须经九转火,选材要待七年时。这种甘耐寂寞、不畏俗论、执着探索、关注学术的风格,贯穿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读者也由此可见编者的良苦用心。

当然,要办好一本学术杂志,仅有执着的求真精神是不够的。杂志终究是给人看的。要让人看,就要有感染力,要能够紧紧抓住人心。学术的感染力在于学术的水准与敏锐性。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支撑一本杂志的灵魂,当是现时学术水准之作。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刊发了许多大师之作,其中也有许多开风气之先之作。许多文章今日读来,仍可感到力透笔墨,气势磅礴,令人忆起那些虽消逝在时光之中,但存留在人心之内的时代风云。特别是一些大师今已做古,睹文思人,令人倍生感伤!

我是研究哲学的,深知哲学即是人学的道理。一本好杂志的灵魂,也是她的人气所在。好杂志是良师,是益友,是提携后学的桥梁,是以文会友的彩虹。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陪伴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文友们同经风雨,走过了科学的春天,涉过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疾风暴雨,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精神的磨砺,思想的交锋,在《社会科学

战线》的字里行间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擦痕，迸发过闪耀的火花。于今春华秋实，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大师曾在此心灵交会，一展笔墨春秋。更有一批莘莘学子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已成为今日文坛的先锋锐将。一览那些如今已蜚声天下的中青年专家的处女之作，可见当年一代风流成长的足迹，对今日的青年学者们，或许会更添几分启迪吧！

人生无涯，世界无限，一本小小的杂志是微不足道的。但滴水可以映日，一叶亦可知秋。读罢《社会科学战线》25年来走过的道路，也令我回忆了自己求学至今25年来的寒窗岁月，更忆及25年来国内学坛之风云际会。正可谓二十五载春露秋霜，几代学人革路蓝缕。多少华章妙笔生花，文采飞扬；多少睿智如风似火，开启心灵；多少才俊辉若群星，璀璨夺目。传大师薪火，展泰斗鸿音，襄助新秀，提携后学，以学术为本，开风气之先，当是《社会科学战线》追求之目标。

记得去岁《社会科学战线》举行创刊25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正在集安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驱车千里，翻山越岭，赶回长春参加庆典。时值十月仲秋，偏偏雪下得早，一路之上弥天飞雪，扬扬洒洒，而满山枫叶，如火如荼，银雪红叶，相映相辉。心中顿生诗兴。愿《社会科学战线》风格如深秋红叶，霜重色浓，激情似火；意境如初冬白雪，自由飘逸，冰清玉洁。

驱车千里过长白，
满途红叶胜花开。
无意秋霜山自老，
有情苍柏绿未衰。
斜风寒雨蔽深谷，
银雪紫枫映高崖。
天地茫茫知时冷，
飞絮万点报冬来。

2004年5月10日



战线无垠思无尽 博文添绿意添新

——为《社会科学战线丛书》序 郝 正

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 来新夏 (1)

从考古学物质文化上观察中华民族融合的痕迹

..... 佟柱臣 (14)

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变化 何兹全 (31)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 顾颉刚 (76)

论语新证 于省吾 (144)

匈奴官印综论 黄盛璋 (160)

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

..... 陈连庆 (181)

唐代“地子”考释 鲍晓娜 (201)

西辽史新证 赵俪生 (222)

黄河源上两大湖

——扎陵、鄂陵名称位置考实 王 尧 (238)

清朝逊国九十年祭 李治亭 (250)

“通古斯”与通古斯的起源 千志耿 孙进己 (274)

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

——兼评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

水平问题的争论 夏明方 (290)

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 王先明 (302)

罗振玉和王国维交往始末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代后记

..... 王庆祥 (326)

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 戚其章 (351)

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研究

..... 刘信君 (365)

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 李昆声 (383)

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

历史考察 赵文洪 (400)

后记 (417)

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

来新夏

考据一称考证，是自汉以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文献的技能或方法，至清而成为专门之学——考据学。关于考据的兴起、发展以至成为专学等问题，我已在《清代考据学述论》^①一文中有所论述。现再就考据的基本方法及如何看待这一门学科略陈臆说。

判断一门学科的社会价值重要的一点在于考察它的应用程度，而能否应用又取决于它是否有一套基本方法。不过，前人专谈考据基本方法的并不多，只能从零散资料中去爬梳归纳。

从考据学的发展历史看，考据是从治经开始，经穷而后入史。其后范围日益扩大。要了解考据的基本方法，首先应了解考据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钱大昕曾明确规定自己考据的对象说：

“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卅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②

这段话说明钱氏对历史的考据范围就在这三方面，即确定地理方位、官名职掌和氏族支脉而已。也证明考证在乾嘉全盛时期的成就不过如此。当然，我们应用考据方法不会只停留在这三点上，而

^① 见《南开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② 《二十四史同姓名名录序》，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四。

应从为研究历史作好准备上着眼，即对文献史料、文物史料及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证。

第一，考证文献史料。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而文献史料的考证辨伪则又是搜集整理的前奏。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说：

“材料不足，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缺乏材料，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这段话不仅指出史料考证的必要性，而且告诉我们对史料要考证的方面——即考证史料的真伪与时代。

史料的真伪对于结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真就是经过检验确是某一时代、某一记载某一事的真实情况，其中是否有所隐讳、错误或捏造等等。这种考证后的史料可以作为说明问题时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料的时代性也很重要，即使史料不伪，但不能用别一时代的真史料来说明此一时代的问题；反之，有些史料虽是伪托而被认为本身是伪，但如能确切考明这是某一时代的作伪品，那也可用作反映作伪时代思想观点的材料。

第二，考证文物史料：文献记载以外的实物、遗迹（如遗址、器物、碑版等）也都是考史的一种依据。但要用这些物证时，必须先确定这些物的可靠性，例如古器物有真贋的不同，遗迹有年代的问题，这都需要进行缜密的考证。这些文物史料考定后就能有力地论证问题，丰富历史的内容。有时，它比文献史料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这样强调过：

“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组织，必须研究遗骨的构造；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

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①

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和确定，使我国历史上推到四五十万年之前；郑州殷代遗址的发现和确定，充实了殷代社会早期的状况。西安秦兵马俑遗迹遗物的发现，加深了对秦朝军事制度及手工艺水平的认识；苏州一批碑刻的考定，有力地证实了明代手工业工人反抗斗争的规模……。把遍及我国的大量文物史料考清，将大有助于历史的研究与论述。

真伪和时代考清也要注意考其内容的真实与否。例如古代金文甲骨文中所记战俘与奴隶的数字，便多有炫功不实之处；名人墓表碑碣，对其生平则有阿谀称德的地方。这些都会有误于知人论世。这都是文物史料的考证范围。

第三，考证史事：过去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记史事有不全、不实、捏造、曲讳、异说种种不同情况。小之于个人的生卒经历，大之于典章制度，政治事件，战事规模，无不应力求其真。尤其是蒙以神秘迷信色彩的史事，更应破其迷雾，阐幽显微。如自然景象之释为灾异祥瑞，农民起义之利用宗教外衣等等。

文献史料，文物史料及史事应是考证的主要对象。但是如何着手，如何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呢？其前提必须要有“致疑”的精神和态度。陈垣先生曾说过：

“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②

这里所说的“能疑”，不是毫无根据地凭主观乱疑，而是在发现疑点，发现矛盾时不轻易放过，然后去思考，通过一些方法、寻求解决途径，终于“得其理”——达到合理的解决。

过去的考证学家究竟采取何种方法以解疑呢。在以长于考证的清代学者论述中除顾炎武尚有较完整的见解外，其他多属片言只语。大抵乾隆以前的总精神是“多闻阙疑”，如顾炎武提出“博学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94—195页。

^② 《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

以文”的口号，主张以“旁搜博讨，夜以继日”的精神来“抉剔史传，发挥经典”^①。他如阎若璩的“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②和马骥的“博引古籍，疏通辨证”^③等等都出“多闻阙疑”的范围。而乾隆以后则已从“多闻阙疑”发展到解疑和穷源竟委，如钱大昕对于难决的问题要求“剖析源流”，对典制考实要做到“了如指掌”，对于“是非疑似难明者”与典制“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④王鸣盛的“求于虚不如求于实”，“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和“总归于务求切实”^⑤等等主张也是要切实解决问题。而高邮王氏父子的考证方法，梁启超曾为之归纳为六步，即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⑥不过王氏父子的“一字之证，博及万卷”的主张则导致了考证学的日趋烦琐。

在这些学者的主张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其中比较完备具体的应属顾炎武。顾炎武在《音学五书》的音论中曾说：

“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意，参伍以谐其韵。”

这虽是指音学而言，但已具体提出了考证的三种基本方法：除本证、旁证已明标其目外，最后所说的以“宛转”、“参伍”之法来审音谐韵，实际上就包含有理证的意义。

根据这些片断资料和一些考证学著作以及前人的论述，考证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

（一）本证：一称内证。就是利用图书本身资料发现矛盾，寻求证据来考定问题。它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 《金石文字集序》《亭林文集》卷二。

② 《清史稿》卷481。

③ 《清史稿》卷481。

④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⑤ 《十七史商榷》自序。

⑥ 《清代学术概论》一二。

- (1) 从图书中所载事实，典制来考定；
- (2) 从图书中所征引的资料来考定；
- (3) 从图书内容的文体和字句来考定；
- (4) 从图书内容的学术思想来考定。

这些考定对于不经见或作者缺名的书和稿本、抄本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图书本身考定以后，也可用此法来考定图书内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主要就用这种本证法。他在《小引》中说：

“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情君子订正焉。”

(二) 旁证：一称他证或补证。就是利用图书以外的有关资料来考定。前人曾经提出过核伪书八法说：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当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贗籍无隐情矣。”^①

八法中的核各种目录，核当代异代著述等项就是旁证的方法。旁证所用的资料，一般有两种，即一书证，二物证。

(1) 书证：这是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图书本身以外的资料来考证。它必须精采，做到多见多闻，所搜集的有关资料最好达到主要资料的“全”，而不追求僻冷资料的“新”。书证可以采取两种方法：

其一：对勘互订：用有关联的图书资料互证，章铤在《白门日札》中曾举出史文对勘的具体作法说：

“史文经对勘互订而益明。昔赵翼之成《廿二史札记》也。以汉书比勘史记之大部，以三国志比勘后汉书之一部，以南史比勘宋、齐、梁、陈各书，以北史比勘魏、齐、周各书，

^① 见惠康野叟：《识余》卷四。

又以北史比勘南史，南史比勘北史，以新唐书比勘旧唐书，以新五代史比勘旧五代史，以辽金史比勘宋史，又以金史比勘辽史、又以宋史、金史比勘元史。”^①

此法最为普遍方便，可供参考。

其二：穷搜博采：考定一事必广泛举例证明，不满足于孤证。有充分证据才下结论。这就需用目录学知识广泛搜求有关人、事、时代的典籍，集中研究有关材料以求是。如此穷搜博采会不会陷于繁琐呢？这就要看是否为考明问题，还是为逞奇炫博。顾颉刚氏有一段话讲的好，他说：

“繁琐不繁琐，不在于考证问题时所引用的材料的多少，而在于所引的材料是不是为了解决考证的问题时所必需的，是不是都有内在联系的。如果是必需引用的，各项材料都是有联系的外证和内证，那么虽多到数十百条，也不该说是繁琐。”^②

(2) 物证：所谓“物”是指文献以外的实物、遗迹，如古代遗址、金石器物、碑版志铭等等。宋、清两代的学者很善于取金石文字来勘正文献。所以有“金石有助于史学”的说法。目录书中也有金石的专类。但物证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可靠，如古器物有真贋的不同，遗迹有年代的远近。不考清真伪和时代就会形成以误证误，甚至以误证是。不过也不要过分迷信实物本身，还要注意考究内容。如青铜器铭文，虽然物本身确已考定，但铭文是否即可深信无疑，还需进一步考虑。

遗迹也是物证，清初的顾炎武就把书证、物证结合考订，取得成效。他所至之处即用文献和遗迹来印证，进行调查访问。全祖望特书其事于神道表中说：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

① 见《天行草堂主人遗编丛刊》。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

勘之。”^①

(三) 理证：凡缺乏证据而根据个人学识以理来判定是非者，就称为理证，这一方法水平高而危险大，稍有不慎，即落入鲁莽武断。胡三省注通鉴有用理证的地方，如卷五以理证断秦坑赵卒四十万为不可能（《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已发其说）陈垣先生所撰《通鉴胡注表微》的《考证篇》中有些例证，可从中理解理证法的运用。

本证、旁证、理证是考证学中的三种基本方法。而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的《考证篇》和《辨误篇》中还提出二点值得初学注意之处，就是：

(一) 考证当注意地理：如《通鉴》载：“唐高祖武德五年，唐使者王羲童下泉、睦、建三州。”

胡注说：“刘昫曰：‘武德四年，以建安郡之建安县置建州。盖隋设泉州建安郡，治闽县，景云二年，改为闽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圣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龙溪、莆田三县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更武荣州为泉州’。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景云二年之泉州也。”

陈垣先生按称：“泉州、福州之名颇纠纷。《十驾斋养新录》十一曰：‘景云二年已前，凡曰泉州者，指今福州也。景云二年之后，凡曰泉州者，指今泉州也。’语本《輿地纪胜》百三十，颇简括，足与此注相发明。”^②

又如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疑》卷七七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条特别强调考证地理之事说：

“凡注地理，须精考史籍，仍参考其他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何可容易著笔乎？”

陈垣先生很推重此说，称：

^① 《鮚埼亭集》卷12。

^② 《通鉴胡注表微》。

“古今地名同者多矣！此条所论，乃注地理者之通则也。”

清代考证家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们整理和注释了古代地理书籍如《禹贡》、《山海经》和《水经注》等，校注和增补了史书中的地理志，都有便於后人的阅读和使用。

(二) 考证当注意数字：如《通鉴》卷四五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条载：

“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

胡注说：“王莽天凤三年，焉耆击杀王骏，西域遂绝，至此五十八载耳。此言与汉绝六十五载，盖自始建国元年数之，谓莽篡位而西域遂与汉绝也。”

陈垣先生以胡注甚精而指明说：

“考史当注重数字，数字不实，则当稽其不实之由。王莽初年，西域虽与中国通，而对手者实为莽，故曰与汉绝，其义甚精，非好学深思不能得其解也。”^①

二

考据本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道工序。它和学术研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为学术研究作整理、复原、鉴定资料工作的，所以，它应在学术研究中有一席之地。但重要的问题在如何看待它的地位和作用。陈垣先生曾对此作过评论说：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史学之一法，固知非大义微言所在也。”^②

以考据为一法而非大义之所在确是深刻之论。清代考据学者在考据工作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但使考据学在后世蒙恶名者也始由

① 《通鉴明注表微·考证篇第六》。

② 《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